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浙江 改革开放 口述史

王祖强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曲青山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

王祖强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 / 王祖强主编.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12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

ISBN 978-7-5098-4934-7

I . ①浙… II . ①王… III . ①改革开放—历史—浙江
IV . ① D61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0331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冬梅

复 审：吴江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8.25

印 数：1—2050 册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4934-7

定 价：41.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改革开放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曲青山

编委会副主任 吴德刚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荣刚 刘晓晨 苏红军 杨建伟 张志仁

胡庆国 徐塞声 高新民 程中才

《浙江改革开放口述史》

主编 王祖强

副主编 俞红霞 孙迪

目 录

-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 铁 瑛 / 1
- 我任省委书记时所做主要工作 王 芳 / 8
- 我所亲历的浙江改革开放历程 薛 驹 / 23
- 学习贯彻南方谈话精神 李泽民 / 38
- 浙江改革前期并非“无为而治” 沈祖伦 / 45
- 回顾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整党工作 陈法文 / 52
- 1991年太湖流域特大水灾记忆 葛洪升 / 62
- 杭州20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大变化 李金明 / 75
- 杭州“一个目标、三个规划”的发展思路 李金明 / 98
- 亲历宁波成为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 葛洪升 / 118
-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筹建 周海梦 / 128
- 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的提出和实施 顾新宇 / 138
- 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前前后后 谢高华 / 154
-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横店的发展之路 徐文荣 / 168
- 我在衢州的工作经历 谢高华 / 182
- 筹建舟山第二海洋渔业公司 张克田 / 194

- 丽水世纪之交的飞跃 丁耀民 / 211
- 丽水撤地设市前后的政府工作 谢力群 / 221
- 开办个人钱庄的五年尝试 方培林 / 232
- 全国首家民间股份制金融机构 杨嘉兴 蔡兆清 / 244
- 全国首例“民告官”案 黄德余 / 258
- 我的汽车梦 李书福 / 273
- 后记 / 287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工作

铁 瑛

解放思想搞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浙江省与全国一样开展了解放思想的运动，主要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展开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们积极支持这场讨论，并始终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6月10日，《浙江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们连续几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学习和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大家在讨论中认为，一定要以实践第一的观点，总结2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各种新问题。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们的讨论情况。

10月5日至12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问题理论讨论会。我代表省委作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报告。强调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当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浙江对“两个凡是”的看法时，我当即代表省委向中央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9年1月4日至22日，浙江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思想武器，总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会议讨论了如何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贯彻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及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集中精力，同心同德，为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英勇奋斗。我代表浙江省委郑重宣布：浙江全省的“揭批查”群众运动已经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但人们的思想认识毕竟不能很快统一，会后有人要与我们辩论，说现在工作重点绝不能转移，“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虽然已经粉碎，但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造反派”的帮派体系还没彻底查清，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

对此，我们一边强调干部要加强学习，一边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讲明为什么要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

1979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浙江的四化建设问题。认为搞好经济工作，必须在指导思想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会议确定今后浙江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搞好综合平衡，以长补短，以轻养重，充分发挥本省的经济优势和特长；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快丝绸、棉纺、麻纺、造纸和工艺美术等轻纺工业、手工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使旅游、外贸事业有较大的发展。

事实上，一直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作出公正全面的评价，人们的思想认识才真正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的硕果

我在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任内，主要领导了浙江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

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开始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主要是撤销人民公社建制，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管理体制为“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又改革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价格，较大幅度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逐步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先后在农村和城市逐步开展了改革。改变了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改变了脱离实际的生产经营方针，经济优势得到发挥，产业结构渐趋合理；逐步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活力，发挥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对内对外实行开放，封闭式经济开始向开放型经济转化；重视了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比较协调。

1979年，浙江国民经济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业方面采用调价、奖售、换购、议价等经济措施，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上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好势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23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其中工业总产值149.36亿元，增长17.9%，增长幅度居全国首位；农业总产值82.09亿元，增长13.4%。

1980年，浙江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276.55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工业总产值为190.43亿元，增长27.5%。80种主要产品的产量有67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1981年，全省贯彻执行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行

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 332.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

到 1982 年，浙江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工农业总产值完成了 36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收成，总产值达 137.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工业生产在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上升，总产值为 230.7 亿元，增长 8%。

这一时期，浙江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起飞，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浙江的发展虽有进步，但离心目中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关于第一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百业振兴。经济工作最终成了各级党委最重要的工作。在经济工作过程中，虽然我们竭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强化管理，合理安排生产，经济指标也大幅度地上升，但总觉得发展还有着某种缺陷，本来经济发展应该还要快些的。症结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我们觉得应该在科学技术上面做文章。当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还在探索总结过程中，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一系列论断，都给我们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1979 年 3 月 10 日至 14 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大会召开。重点是解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并讨论了 1979 年科技计划及 1978 年至 1985 年科技发展规划草案，奖励了一批科研成果。

1980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全省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浙江省科研工作的任务。

1981 年 6 月 16 日至 22 日，在浙江省科技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各

级领导要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靠科学技术的认识。

1983年1月，我在《工人日报》上发表题为《从实际出发开创工业生产新局面》的文章，强调“要狠抓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现有3万多个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指明“像浙江这样人多地少，重化工资源不足，加工工业比重大的地方，更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有计划地把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

由于我们认识早些，抓得比较紧，至1982年，浙江有22个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获得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的“农业科技推广奖”。这大大促进了浙江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科教兴省”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打下了基础。

抓文化教育

科技工作的发展有赖于教育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这就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浙江素有“文化之邦”的美称，教育事业发展的起点较高。但由于种种原因，浙江大专院校数目偏少（当时只有11所），无形中极大地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教育事业逐步重视起来。

1977年11月5日，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我作了《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工作搞上去》的专题讲话，强调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办学的方针，使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正确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一条多快好省的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1980年1月5日，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通知》，规定浙江省职工教育的目的、任务，并且提出为鼓励职工学习，要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这掀起了全省性业余学习的高潮。

1981年6月16日至22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

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打下基础，而科技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建设也同样有着不可偏废的地位。浙江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文化渊源深厚，戏剧颇有特色。我们同样花精力抓文化工作，并且抓出了一定的成效。浙江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文艺界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深入生活，放开手足，大胆创作。各级党委对文艺工作要担负起扶持、引导的责任。”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成功，就是当时大胆扶持文化方面的一个典型。

当时，戏剧领域出现严重的青黄不接和后继乏人的状况，使我们十分吃惊。我们深知文化工作对于人们精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戏剧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一。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有广泛的观众。而1979年国家文化部筹备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时，浙江却无法组团参赛，更谈不上取得好的名次。

我们了解了这一严峻现实后，毅然支持浙江文化部门的筹划，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生，组团参赛，争取在几年内培养出一批戏剧新人。当时这个招生在人事和劳动工资方面算是新的突破，在我们几位省委常委的支持下，招生终于落实了。但小百花演出团胜利归来后，又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即这个并无编制又是从各地抽调来的20几位新秀组成的临时剧团，是继续组团，还是分返各地？我们听取汇报后认为人不能散，并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决定成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这样几年后，就有了全省戏曲的小百花会演，也才有浙江越剧重新享誉海内外。

江南春来早

1983年春节前夕，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将到杭州，与浙江人民共度新春佳节。

我的心里不禁涌过一股暖流。小平同志到杭州来，要亲眼看看改革开放后浙江的蓬勃发展，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小平同志。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省委机构改革的方案上报中央，并已获得中央政治局批准。我与原省委的大多数同志都将退居二线，提拔一批年轻同志担任领导，只是根据中央指示尚未对外公布。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小平同志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伸出手来与我和李丰平、王芳、薛驹同志一一握手。

我们想小平同志已经是近80高龄的老人了，鞍马劳顿，还是请他先休息几天。小平同志摇摇手说：我不累，大家进屋里一块儿谈谈。于是我们一起进了屋里。

寒暄一番后，我开始汇报。当我讲完第一个问题“省委机构改革情况”后，小平同志说：“班子如果可以再年轻一些，11个常委中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就更好。”接着，我汇报第二个问题“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我们分析了浙江工农业发展情况，提出“到2000年翻两番半到三番是可能的”。

“噢？你们有信心能翻两番半到三番？”小平同志面带微笑认真地反问道：“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措施？”

“有的。”我接着汇报了省委目前抓紧的五项工作：解放思想，抓改革，抓科技和教育，发挥浙江轻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

汇报了近两个小时，小平同志全神贯注，毫无倦容。听完，他露出满意的微笑：“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

我任省委书记时所做主要工作

王 芳

出任浙江省委书记

1981年2月中旬“两案”审判结束后，我回到杭州已是除夕前夜。我继续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分管政法工作、外事工作，主持人大常委会工作。

6月，我去广州，主要解决与华南、广东在隐蔽斗争中的配合协调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同时参观学习、考察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其时特区刚刚起步，蛇口区域正在大规模地搞“三通一平”，建设已经铺开，形势很好，深受启发。我还会见了港澳的霍英东等一些著名人士。

8月底，我去中央党校学习半年。

1982年9月1日至11日，我作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浙江省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铁瑛、薛驹；袁芳烈、陈作霖当选为候补委员。李丰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二大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党英明果断地处理林彪、

江青两个集团，经过拨乱反正后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有幸参加这次大会，深受教育，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3年2月9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到浙江视察。刚来那一天，小平同志一到刘庄住地，不顾旅途劳顿，就要迎候他的中共浙江省委领导铁瑛、李丰平、我和薛驹进到会见厅。这次小平同志是从江苏苏州过来的，主要是调查、思考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民生活实现小康的问题。他讲了苏州的经验和苏州人的生活水平。他神采奕奕，非常高兴，说苏州人的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吃穿问题已经解决，住房问题也基本解决，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0平方米。他说，就业问题解决，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美元以上，教育问题也可望解决。他也仔细地听取了铁瑛和李丰平同志的汇报，并对浙江省委提出的到2000年可望实现翻两番半到三番的目标，表示很满意。

当时正值机构改革，铁瑛同志也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浙江省委班子调整方案。小平同志对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安排也拍板认可，并强调指出省委常委班子中要有两个50岁以下的同志。

3月初，中央对浙江省委的领导班子进行全面调整，铁瑛、李丰平等老同志退到二线，我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任副书记、省长。

机构改革后，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这样我担任了浙江解放后第七任浙江省委书记。

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任期1949年5月—1952年9月；

第二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任期1952年9月—1954年8月；

第三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任期1954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

第四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南萍，任期1971年1月—1973年5月

(1972年3月以后停职，不主持省委工作)；

第五任浙江第一书记谭启龙，任期1973年5月—1977年2月；

第六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任期1977年2月—1983年3月；

第七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任期1983年3月—1987年3月。

中共中央任命浙江省委常委班子后不久，同年4月底，就召开了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的领导班子和法、检“两长”。原省长李丰平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薛驹当选为省长，王家扬当选为省政协主席。

经过10个多月的积极筹备，并经中共中央批准，1983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80名，候补代表68名，代表全省117.6万余党员。会议提出了全力推进经济建设，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振兴打好基础，努力争取提前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使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我代表上届浙江省委作的《沿着十二大确定的正确道路，全面开创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审议和批准了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了两个报告的决议。会议通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产生了由49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同时选出了浙江省顾问委员会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12月2日，中共浙江省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我为书记，陈法文、吴敏达为副书记；常委有王芳、薛驹、陈法文、吴敏达、张兆万、罗东、沈桂芳、张秀夫、厉德馨、王维澄、马骥良等12人，其中有两位50岁以下，落实了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铁瑛同志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张敬堂、崔健同志任副主任。陈作霖同志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会议开得非常顺利。

我代表上届省委作的报告，对浙江的省情作了客观分析后，提出今后我们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是：要把中央有关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同我省的实际结合起来，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1. 一切经济工作都要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不论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基本建设，各行各业都要努力做到决策正确、技术进步、经营得法，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克服不讲质量，不计成本，不顾社会需要，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片面做法。

2. 紧紧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科技三个战略重点。特别是抓好电力、铁路、港口和内河航运的重点建设项目，使我省能源、交通紧张的状况得到缓解。

3. 在发挥原有拳头产品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坚持保护和合理开发各种自然资源，大兴山海之利，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有计划地发展新的工业生产门类，特别是发展耗能少、污染少、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and 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4. 领导经济工作要从单纯抓生产转到生产流通一起抓，放眼国内外市场，把我们需要的新技术和原材料搞进来，把我们的产品打出去，使我省的经济逐步从半封闭、技术落后的状态，转变到开放的、社会化商品化的、技术进步的现代化经济上来。

5. 继续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根据中央的部署，搞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生产的发展。

报告强调，今后的五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着重在以下几方面下工夫：继续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加快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搞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调整改组，发展有浙江特色的工业经济；集中力量，保证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高度重视智力开发；积极开拓市场，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环境保护，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继续改善人民生活；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要求，大胆探索和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那个时候，党的大批领导干部正处于新老交替之际，从我们这届省委班子的组成人员看，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当年，胡耀邦同志提出